

“符号学研究”特辑

从“新闻学”到“媒介学”:以符号学为基础的学科升华*

张 骋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新闻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仍然不完善。走向符号学,有助于新闻学研究摆脱困境。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并不能使新闻学真正得到升华,因为符号学并没有为新闻学带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新闻学走向符号学的方式应该是在符号学的基础上,找到新闻学与符号学之间的本质关联。这个本质关联就是符号与媒介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学应该利用符号与媒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走向媒介学。媒介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以媒介的视角理解人类存在方式”,这也是媒介学能够为新闻学带来的独特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新闻学;符号学;媒介学;人类存在方式

中图分类号: I0-02;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17)04-0128-04

一、引言 “新闻学”这门学科大致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形成了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但是,时至今日,新闻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建设仍然不太成熟,新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大,“新闻无学”的呼声仍然没有绝迹。不少学者都对新闻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批评,例如童兵教授指出“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学术水平不高,‘新闻无学论’虽然有所纠正,但新闻学研究尚未走完从术到学的科学化进程”^{[1]263};陈力丹教授指出“从知识结构和层次上看,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总体上还相当浅薄,研究方法也相当落后”^{[2]45};黄旦教授也指出:新闻学研究“一直显得底气不足而且步履蹒跚。且不说似乎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就足以显出对于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3]76}

针对这些问题和批评,学者们也提出了如何使新闻学走出困境的方法。其中,“走向符号学”是很多学者持有的观点。例如,四川大学蒋晓丽教授指出“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研究,其直接目的在于找寻到一种能够化解传统新闻学矛盾与困境的方法,其最终价值则在于能够构建一种有利于平等、多元、正义地进行新闻传播的观念。”^{[4]5}西北大学李玮老师也指出“以系统的方式,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领域。一定程度上说,这既可以丰富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又可以拓宽

符号学理论和方法的门类应用。”^{[5]39}

笔者非常赞同以上观点,“走向符号学”的确是新闻学研究走出困境的一条非常好的路径。不过,新闻学应该如何走向符号学?是否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就可以使新闻学研究真正得到升华?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二、以符号学视角重新定义“新闻”的意义 什么是新闻?目前,学术界对于新闻的定义主要有“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三种。这三种定义都有各自的道理,都从某个方面概括出新闻的本质,但这三种定义都有各自的局限,所概括出的新闻本质都是片面的。

“事实说”的代表人物和观点有:范长江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未知的重要事实”;法国学者贝尔纳·瓦耶纳的“新闻即刚发生和刚发现的事物”。“事实说”的价值在于将“新闻”与“文学”、“哲学”、“艺术”等体裁区别开来,强调了新闻的事实属性,但它的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新闻作品与新闻事实之间并不是“镜子式”的反映,呈现到受众面前的新闻作品一定是经过传播者、受众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建构出来的。

“报道说”的代表人物和观点有:陆定一的“新闻史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美国学者约斯特的“新闻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报道说”的价值在于强调了新闻

* 收稿日期:2017-01-19

作者简介:张骋(1985—),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传播符号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13&ZD123)。

人对于新闻事实的筛选、加工和改造的过程,突出了新闻人的建构作用,但它忽略了新闻作品是由新闻人和受众共同建构出来的。

“信息说”的代表人物和观点有:宁树藩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信息”,黄旦的“新闻是被传播(报道)的事实的信息”。“信息说”的价值在于强调了受众的主体性,因为信息是能够消除受众不确定性的东西,但是“信息说”仍然忽略了新闻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属性。

针对这三种学说的局限,有学者提出了“符号说”,即从符号学的视角来定义新闻。比如,四川大学张小元教授认为:“新闻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样式,它是具有社会的特殊意识形态性质的、凝聚着新闻人自己的观念的、沟通人际的信息交流的话语符号。”^{[6]17}西北大学李玮老师也将新闻定义为“关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符号叙述”^{[7]140}。笔者非常认同“符号说”的观点,以符号学的视角定义新闻的确可以克服传统新闻定义的局限,因为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生成、表达、传播和解释的学问,既可以挖掘出新闻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和价值,又可以揭示出这些意义和价值是由传播者、受众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建构出来的。

很多学者认为,以符号学的视角来定义新闻除了可以揭示出“新闻的本质是一种符号”之外,还可以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进而解决新闻学研究遭遇的困境,使新闻学得到升华,使符号学的应用领域得到拓展,“新闻符号学”这门学科也就此诞生。笔者也认为新闻的本质是一种符号,但是,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是否真的就可以使新闻学研究走出困境、得到升华。

李金铨教授曾经批判过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卷化”过程,即“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围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8]62}。笔者认为,当前的“新闻符号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做得也很深入和细致,但并没有使新闻学研究真正摆脱“内卷化”的尴尬,也没有使新闻学真正得到升华。因为一个学科升华的基础不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术语的创新,而是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的创新。

笔者在前文中提到,虽然符号学可以挖掘出新闻背后的意义,并且揭示出这些意义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但是,与新闻学相关的其他理论也涉及了这些问题,并且也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比如,传媒社会学就致力于探讨社会的各种结构、组织以及新闻生产者的个人心理和认知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传播学里面的“把关人”、“使用与满足”等理论也是在探讨传播者和受众是如何将个人的经验、态度、观念介入到传播过程中的。此外,塔奇曼的“新闻框架”理论将新闻看成是一种用框架建构的现实。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出新闻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詹姆斯·凯瑞的“仪式传播观”也认为传播的目的就是建构一个充满意义的文化世界。约翰·菲斯克的“生产者式文本”理论指出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受众)建构出

来的。

由此可见,“新闻符号学”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并不是只能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得到。“新闻符号学”仅仅是将这些规律用不同的方式表述出来而已,最多也只是表述得更清楚、更深入,并没有为新闻学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没有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输出自己的理论观点。14世纪的逻辑学家奥卡姆提出了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定律。该定律认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意思是说,在学术研究中,一个问题如果能用简单的方式表述清楚,就不要去增加概念和名词。因此,笔者认为,以符号学视角重新定义“新闻”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能够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而在于新闻学能以符号学为基础得到升华,这种升华使得新闻学能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能够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输出自己的理论观点。那么,新闻学如何才能以符号学为基础得到升华,这种升华将使新闻学走向何方?

三、符号与媒介的关系 如果新闻学想要走向符号学而寻求学科升华,就不能仅仅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而应该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寻找符号学与新闻学之间本质上的关联,这种本质上的关联可以使新闻学真正得到升华。笔者认为,符号学与新闻学之间的本质关联就在于符号与媒介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符号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赵毅衡教授认为“符号依托于一定的物质载体,载体的物质类别称为媒介。”^{[9]123}唐小林教授也指出“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是媒介。”^{[10]147}笔者非常认同两位教授的观点,那么,符号与媒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

符号是“携带着意义而接受的感知”^{[11]48}。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任何符号都有其可感知的部分,比如,索绪尔的“能指”、皮尔斯的“再现体”、叶尔姆斯列夫的“再现体”就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这个可感知部分就是人们与符号相接触的部分。比如,人们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接触到的是文字;人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接触到的是音符。并且,这个可感知部分也是符号产生意义的条件。赵毅衡教授将符号意义的产生过程称为“形式直观”,即“意识把‘获义意向活动’投向事物,把事物转化为成‘获义意向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意义。”^{[12]3}也就是说,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一定投向的是事物的可感知部分,并且这个可感知部分并不是事物的整体,而是被意识“区隔”出来的一部分观相,这一部分观相就可以代表符号的意义。比如,当我们的意识投向苹果这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投向苹果鲜红的观相,就能够解读出苹果新鲜的意义,而不需要投向苹果这个整体。这里的“鲜红”就是苹果的可感知部分,而“新鲜”就是这个可感知部分反馈给意识的意义。斯图尔特·霍尔也指出“口语用声响,书面语用词语,音乐语言用调性序列中的音符,身体语言用身体姿势,时装业用制装面料,面部表情语言用调动五官的方式,电视用数码或电子产生的荧屏上的色点,交通信号灯用红、绿、黄色——来‘说话’。”^{[13]7}这里的“口语、书面语、音乐语言、身体语言、时装业、面部表情语言、电视”就是符号,“声响、词语、音符、身体姿

势、面料、色点等”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这里的“说话”就是指产生意义的过程。斯图尔特·霍尔的这段话也说明符号是依靠其可感知部分来产生意义。由此可见,可感知部分对于符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构成符号的必要条件。一个符号可以没有所指、没有对象,但绝对不能没有能指、没有再现体。正如赵毅衡教授指出“各种符号可以有不同的构造……但不管符号怎样构造,怎样跳,都跳不出‘能指’,跳不出‘再现体’,否则,就不成其为符号。”^{[14]8}

在这里,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扮演的就是媒介的功能。什么是媒介?最新版的《当代汉语辞典》将媒介定义为“居中使二者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在新闻学中,媒介通常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工具;在传播学中,媒介被认为是载体、渠道、行为方式的集合体。在符号学中,“媒介即是储存与传送符号的工具。”^{[9]123}综合以上各个学科对于媒介的定义,笔者认为,媒介就是使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载体、渠道、工具。

根据这个定义,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确实是一种媒介。正如笔者前文所言,人想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须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投向这个事物的可感知部分,这个可感知部分就可以把事物的意义反馈给意识,事物也就变成了携带意义的感知,即符号。因此,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就是人认识事物的媒介,人的意识不可能直接认识到事物的意义,只有通过这个媒介才能与事物发生关系,才能解读出事物的意义。比如,苹果鲜红的观相就是一种媒介,这个媒介使人能够意识到苹果新鲜的意义。

此外,不仅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是一种媒介,符号本身也是一种媒介。符号将人与自然界割裂开来,因此,符号就充当了人与自然界产生联系的媒介。著名符号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15]33}由此可见,在卡西尔看来,人不能直接面对自然界,人所面对的都是由语言、艺术、神话、宗教等符号所构筑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是我们与自然界打交道的媒介。并且,人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得纯粹的事实,也不可能获得纯粹的事实,而是获得意义。意义的获取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但“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16]47}。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也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获得意义的必不可少的媒介。

四、“新闻学”走向“媒介学”的意义 前文指出,新闻的本质是一种符号,符号又是一种媒介,那么,新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一直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点,似乎新闻学走向媒介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暨南大学谭天教授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新闻业将会蜕变为大传媒、新业态的现代传媒业。……诚然,新闻研究仍然是传媒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但传媒学的研究范畴无疑要比新闻学

宽广得多。传媒学研究不仅超越新闻,而且超越内容生产,进入到传播和运营。”^{[17]41}(本文中的“媒介学”与“传媒学”、“媒介”与“传媒”都是指同一个意思,因为传媒就含有媒介的意义)不过,笔者认为,新闻学走向媒介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扩充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因为研究范畴的扩宽不一定能带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新闻学走向媒介学之后,想要获得学科升华,就应该以符号学为基础,因为符号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论和方法论的存在,已经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作为本体论的符号学能为新闻学带来独特的理论视角。

符号学之所以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因为符号不仅是传递意义的工具,还是产生意义的条件。意义的产生是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将客体变成符号。客观世界在被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激活”之前,是一片没有意义、没有秩序的混沌,在受到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压力之后,客观世界才变成一个有意义、有秩序的符号世界。具体说来,“客体变成符号”的过程是一个片面化的区隔过程,这个区隔过程是意识获得意义的前提。因为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不可能也没必要认知到客体的所有方面,解释者必须从客体中区隔出与意义相关的品质,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品质成为携带意义的感知,也就成了符号。有了符号也就有了意义。进而言之,人生在世的基本前提就是通过符号赋予世界以意义,持有不同符号体系的人所理解的世界也完全不同。寻找意义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符号作为产生意义的条件,就成了人类存在的家园,也就成了为自然界“立法”的本体。

既然符号具有本体的意义,那么媒介也就具有本体的意义,媒介也是产生意义的条件,使用不同媒介的人所理解的世界也就完全不同。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就将媒介视为一种本体。麦克卢汉将人类发展史看成是一部媒介的发展史,他认为,媒介作为一种重要的变革力量,对个人和社会都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进而决定人的思维方式,推动社会的变革。美国传播学家波兹曼也认为,媒介本身是一种符号结构。人们在使用一种媒介的时候,就进入了这种媒介所构筑的符号结构之中,这个符号结构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解释世界。笔者在拙著《传媒本体论:新媒体时代的理论转向》中也指出“传媒已经不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用于认识和了解客观世界的工具,而是事物存在和自我发展、自我揭示的领域。我们置身于传媒世界中,理解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切存在之物。”^{[18]2}媒介学建立的基础就是将媒介视为一个本体,从而探讨“媒介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

“媒介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蕾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媒介学的功能正是要建立技术领域和神话领域的关系。”^{[19]35}这里的技术是指媒介,神话是指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换言之,媒介学就是探讨“媒介技术与人类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

进而言之,媒介学到底能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怎样的理论视角,这也是媒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人的本质属性”而展开。例如,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宗教学、伦理学等

人文科学是以人的精神属性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是以人的社会属性为研究对象。那么,媒介学也是以“人的本质属性”为基本出发点,从媒介的角度认识人的本质,从媒介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的属性。换言之,媒介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以媒介的视角理解人类存在方式”,这是媒介学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媒介学能够为其他人文学科输出的独特的理论视角。

具体来说,媒介学应该如何来理解媒介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传统新闻学在研究媒介的时候,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都被视为一种被人所使用的中立性工具。这种工具论媒介观虽然没有错,但是遮蔽了媒介的丰富内涵,没有揭示出媒介与人类存在之间的根本联系。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即“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20]942}。也就是说,从本质来看,技术是一种对事物的解蔽方式,这种解蔽重新建构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媒介也是一种技术,那么,媒介也是一种“座架”。丹麦学者延森认为媒介是“一种中介化实践,并非是主体连接客体的工具,而是主客体得以呈现彼此的交互界面,因此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21]54}。这里的“中介”不是工具论意义上的中介,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中介,这个中介是任何关系发生和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延森看来,媒介作为一种中介,是先于主客体而存在的,它重构和决定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媒介与人类存在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媒介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由此可见,“新闻学”走向“媒介学”的最大意义不是扩充了自身的研究范畴,而是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新闻学与符号学发生关联是一种必然,因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但是,新闻学与符号学发生关联的方式一定不能仅仅是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因为这样并不能为新闻学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最多只是将新闻学原有的理论换了一种表述方式而已。新闻学应该以符号学为基础而走向媒介学。只有走向“以媒介的视角理解人类存在方式”的媒介学才能使新闻学摆脱目前的困境,才能使新闻学真正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 [1]童兵. 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 [2]陈力丹. 成果丰硕 任重道远——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十年回顾[J]. 中国新闻年鉴,1992.
- [3]黄旦. 重建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J]. 国际新闻界,2015(1).
- [4]蒋晓丽. 走向符号学:新闻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J]. 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3).
- [5]李玮. 新闻符号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 [6]张小元. 回归与超越——理论新闻学新视野[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 [7]李玮. 语境变迁下的“新闻”定义的再思考:以符号叙述学为视角[J]. 符号与传媒,2016(1).
- [8]李金铨. 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J]. 书城,2014(2).
- [9]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0]唐小林. 符号媒介论[J]. 符号与传媒,2015(2).
- [11]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2]赵毅衡. 形式之谜[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13][英]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 徐亮,陆兴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4]赵毅衡. 回到皮尔斯[J]. 符号与传媒,2014(2).
- [15][德]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16]宗争. 马克思辩证法视野下的符号—意义论[J]. 符号与传媒,2016(2).
- [17]谭天. 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到“传播学与传媒学”[J]. 新闻记者,2015(12).
- [18]张骋. 传媒本体论:新媒体时代的理论转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19][法]雷吉斯·德布雷. 普通媒介学教程[M]. 陈卫星,王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 [20][德]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主编. 北京:三联书店,1996.
- [21]孙玮. 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J]. 新闻记者,2014(12).

责任编辑:万莲姣

From “Journalism” to “Media Studies”: a disciplines sublimation based on semiotics

ZHANG Cheng

(College of Movie and Media,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After nearly 10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Moving towards semiotics, helps Journalism to get rid of the plight. However, if we just take the semiotic theory and method into journalism, journalism can not be really got sublimation, because semiotics can not bring the unique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point to journalism. The way of journalism moving towards media studies should be based on semiotics, and find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ournalism and symbols, which is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 between the symbol and the media. Journalism should use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s and media to move towards media studies. The core problem of media studies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to understand the human existing way”, which is the unique theory angle which media studies is able to bring to journalism.

Keywords: journalism; semiotics; media studies; the human existing way